

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鲜明特征与建设路径

蓝庆新 韩 晶

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竞争力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四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指出：“抓科技创新，要着眼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教育、科技、人才一起抓，既多出科技成果，又把科技成果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生产力。”现代化产业体系是实现经济现代化的关键标志，将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夯实物质基础。当前，人工智能技术等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推动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内涵不断丰富、特点更加鲜明。

更加智能。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带来了生产要素的创新性配置，促进了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转型升级。目前，世界主要国家都在不断发力，促进数字经济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力图在未来全球产业格局中获取先机。我们必须在产业体系各环节广泛应用数智技术，大力发展智能制造和数字化服务，使产业链上中下游的全要素生产率共同提升，实现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协同共生。

更加绿色。绿色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推动产业绿色化，既是解决我国资源约束和环境压力的基础，也是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这要求在供给侧运用绿色技术和标准，实现节能减排、清洁生产 and 资源高效利用，促进产业绿色转型，催生绿色新业态和新模式；在需求侧通过推进绿色服务和倡导绿色生活方式，形成绿色有效需求，倒逼产业体系绿色化；

在产业空间布局上，统筹经济与生态协同，实现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生态空间宜居和美。

更加协调。随着科学技术发展，前沿科技跨领域交叉融合趋势越来越明显，行业边界越来越模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产业门类之间、大中小企业之间协同配合，能够更好释放产业网络的综合效益。这要求农业、工业、服务业三次产业之间协调发展、相互融合，进而发挥整体效能；要求产业政策之间相互协调，包括从中央到地方的产业规划和发展政策相互联动，避免重复建设，促进各产业发挥最大效能；要求产业主体协同共生，通过机制创新、要素集聚、平台搭建、数智赋能和政策支持，推动形成大中小企业协同联动、竞合共生的现代发展格局。

更具韧性。当今世界，产业竞争日益体现为产业体系的整体竞争。提高产业体系韧性和安全水平，能够更好适应外部环境变化，即使在受到封锁打压时也能维持有效运转。特别是面对一些国家日益增强的“脱钩断链”措施，保持供应链安全稳定和自主可控尤为重要。为此，要结合自身优势积极培育核心产业链，推动产业核心技术自主创新，强化产业体系中的中间品的适配性，不断增强产业体系韧性。

更加开放。经济全球化极大推动了跨越国界的贸易往来、资金流动和生产服务等经营活动，各国产业体系彼此交织，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产业发展格局。改革开放后特别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我国产业发展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全球产业升级

也离不开中国产业的不断进步。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必须保持并深化产业体系的开放性，通过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广纳国际优质资源，开发国际市场，强化国际合作，拓展融入全球分工体系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提升产业体系技术能力和国际竞争力水平。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今年要抓好的一项重点工作并作出具体部署。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and 党中央决策部署，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关键要充分发挥科技创新的引领作用。要发挥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集中攻关、自主研发，实现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同时，加强新一代信息技术、先进制造技术、现代管理技术等深度融合，既通过新技术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又通过数智技术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推动智能生产线、智能车间、智能服务平台建设，推动新旧动能加快转换。要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加快发展绿色低碳产业，推动绿色产业链、绿色价值链、重大工程项目的全生命周期绿色管理，抢占国际产业绿色低碳竞争的制高点，释放绿色低碳产业的巨大发展潜力和强大带动能力，使之成为经济持续增长的新引擎。同时，要尊重产业发展客观规律，坚持因地制宜，充分结合各地要素禀赋特征和产业发展情况，精准发力、科学布局，决不能脱离自身条件和比较优势搞盲目重复建设。积极推动制度型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广泛聚集国际优质创新资源，努力在开放中推动产业体系现代化。

增强党内法规权威性和执行力

孙乐艳

法规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要“完善党内法规，增强党内法规权威性和执行力”。新征程上，只有进一步增强党内法规执行力，以党内法规的刚性落实推进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才能把法规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

注重党内法规制度建设，重视提升党内法规制度执行力，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管党治党的优良传统。马克思恩格斯早在制定《共产党人同盟章程》时，就明确提出所有盟员必须“服从同盟的一切决议”等纪律要求。他们在指导第一国际建设和领导无产阶级革命的斗争中，强调要用民主制度对权力进行制约，“始终力求做到以原则为准绳，而不是以这个人或那个人为准绳”。特别是在党的纪律建设问题上，马克思针对当时的宗派主义分裂活动指出，“我们现在必须绝对保持党的纪律，否则将一事无成”。列宁在领导无产阶级革命过程中强调，要用“铁的纪律”规范全党，任何党员都不得以任何名义违背党的原则、践踏党的纪律，无产阶级政党内部必须实行极严格的集中和极严格的纪律。

一百多年来，我们党始终要求严格执行制度，把遵规守纪内化为党员干部的思想自觉和政治自觉，确保党的先进性纯洁性。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强调，“党的各级机关解决问题，不要太随便。一成决议，就须坚决

执行”。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同志要求全党要严格依据党章对自身进行对照检查，并“根据各自的具体情况，作出达到和坚持党章规定的合格标准的努力计划，并保证其实现”。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内法规不少，主要问题在于执行不力，有的是缺乏执行能力，有的是缺乏执行底气。要强化法规制度执行，不能打折扣”。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之所以能开辟自我革命新境界，非常重要的一条就是把党内法规制度建设作为全面从严治党之策、根本之策，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的党规党纪意识显著增强，管党治党成效显著。

制度成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制度执行力。新征程上，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重点解决制度执行力问题，强化执规意识，压实执规责任，健全执规评估体系，确保党内法规时时生威、处处有效。

抓好党员教育培训，增强遵规守纪意识。把党内法规学习好、理解好，才能把党内法规执行到位。为此，应加大党内法规宣传力度，增强广大党员干部的遵规守纪意识，使制度治党管党治吏成为全党共识。把党内法规制度列入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内容，列入党校（行政学院）、干部学院必修课，列入法治宣传教育规划重要任务，以专题讲座、学习讨论、领导干部任前党纪法规集体谈话教育等多种形式推进学习常态化。用好“三会一课”、主题党日、民主生活会、组织生活会、谈

心谈话等组织生活制度，加强对党内法规的日常学习，切实把严格执行党内法规制度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完善监督考核机制，压紧压实执规责任。破解党内法规执行难问题，必须明确责任主体，健全监督机制，确保可执行、可监督、可检查、可问责。细化责任清单，建立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委办公厅（室）统筹协调、主管部门牵头负责、相关单位协助配合、党的纪律检查机关严格监督的执规责任制，明晰各执规主体的职责边界。优化监督方式，注重党内法规监督检查与巡视巡察、党内督促检查、监督检查等工作有机融合，建立健全法规制度执行督查制度，以专项检查、随机抽查等多种形式，常态化组织监督检查。加强考核问责，对执行党内法规打折扣、搞变通或者选择性执行等情形，依规依纪追究责任。

健全效果评估体系，不断提升执规质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深化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改革，做好顶层设计，查漏补缺、提质增效文章，面向实践建设，及时将好经验好做法上升为制度，着力提高制度执行力”。应完善评估标准，建立健全党内法规制度执行情况和实施效果评估办法，真正评出质量、评出实效。深化结果运用，建立健全评估结果反馈机制，为提升党内法规执行力、破解执行难提供实践依据和评估信息支撑，更好一体推进法规制度的立、改、废、释，促使党内法规制度体系更加科学，实现良规善治的治理效能。

积极建设老年友好型社区

戈艳霞

社区是人们日常生活的空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完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网络，构建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医养康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近年来，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社区居家养老服务需求快速增长。在社区内嵌入优质、专业养老服务资源，积极建设老年友好型社区，满足老年人不出社区就能享受到优质服务的需求，不仅有利于降低养老成本，还能让优质养老服务惠及更多老年人。这既是有效发挥社区作用、更好满足老年人养老服务需求的重要举措，也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构建老年友好型社会的重要支撑。

积极建设老年友好型社区，通过提升社区服务能力和水平，致力于更好地满足老年人在居住环境、日常生活、健康服务、养老服务、社会参与、精神文化生活等方面的需要，能够切实增强老年人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老年友好型社区建设主要包括3个方面。一是空间环境友好，充分考虑老年人的身体状况和生活需求，对生活环境进行适老化改造。比如，在公共空间方面确保道路平整、照明充足，并配备适老健身设施与休息座椅；在交通出行方面推进交通设施的适老化改造和站点的优化布局；等等。二是社会支持友好，构建高效便捷的服务体系，广泛覆盖老年人日常生活与健康等多层次、多样化需求，有效缓解家庭养老的压力和负担；同时，着眼促进老年人社会参与，通过开展数字素养提升、文体娱乐、社会交往等活动，帮助老年人共享发展成果。三是人文关怀友好，加强社区包容性文化建设和，倾听老年人心声，尊重老年人的生活阅历，充分保障老年人生命尊严与文化权益，使不同思想观念和身体状况的老年人都能找到归属感。

我国高度重视社区在提升老年人生活质量中的积极作用，近年来先后出台多项政策文

件支持推动老年友好型社区建设。国家卫生健康委、全国老龄办印发的《关于开展示范性全国老年友好型社区创建工作的通知》明确，到2025年在全国建成5000个示范性城乡老年友好型社区，到2035年全国城乡实现老年友好型社区全覆盖；《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提出“开展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创建活动，将老年友好型社区建设情况纳入文明城市评选的重要内容”；《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发展的意见》提出“强化社区养老依托作用”并作出部署。经过持续努力，我国老年友好型社区建设取得积极成效，但其建设水平与我国人口老龄化速度、与老年人的需求相比还有差距。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了今年要抓好的重点任务，其中包括“发展社区支持的居家养老，扩大普惠养老服务”；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推进社区支持的居家养老，强化失能老年人照护”等。为此，应坚持问题导向，重点围绕改善老年人的居住环境、方便老年人的日常出行、扩大老年人的社会参与、丰富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提高为老服务的科技化水平等，提升老年友好型社区建设质量和水平。

打造老年宜居环境，提升空间环境友好度。落实无障碍环境建设法规、标准和规范，将无障碍环境建设和适老化改造纳入城市更新、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农村危房改造、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中予以统筹推进，让老年人参与社会活动更加安全方便。在鼓励推广新技术、新服务方式的同时，保留老年人熟悉的传统服务方式，加快推进老年人常用的互联网应用和移动终端、APP应用适老化改造。同时，顺应老年人居家养老的意愿与趋势，以满足老年人居家生活照料、起居行走、康复护理等需求为导向，鼓励和引导各地结合实际出台家庭适老化改造标准，鼓励更多家庭开展地面防滑处理、

加装卫浴扶手等适老化改造，增强老年人居家生活的安全性、便捷性与宜居性。

健全社会支持体系，促进老年人社会参与。促进老年人社会参与，可以帮助老年人在参与经济劳动、志愿活动、家庭照料活动中既满足自身需求又实现自身价值。为此，要加强社区支持体系建设，开展新时代“银龄行动”，把老有所为同老有所养结合起来，完善就业、志愿服务、社区治理等政策措施，充分发挥低龄老年人作用。可建立老年教育协同发展机制，依托老年大学等，在养老服务机构和社区开展线上线下相结合的老年教育，完善社会力量发展老年教育扶持措施。为有劳动意愿的老年人提供职业介绍、职业技能培训和创新创业指导服务，探索适老老年人的灵活就业模式。同时，强化医疗卫生服务与养老服务在政策体系、服务制度、业务流程等方面的有机结合，加强养老服务机构和医疗卫生服务机构协同，促进医养结合。

强化社会孝老敬老，增强人文关怀。养老照护不仅需要物质保障，也需要人文关怀。为此，要通过实施中华孝亲敬老文化传承和建设工程，结合时代楷模、道德模范等评选，选树表彰孝亲敬老先进典型。进一步深化“敬老月”系列活动，将老志愿实践纳入中小学综合实践活动和高校学生实践内容；深入开展“敬老文明号”创建活动，营造全社会尊重、关爱老年人的良好氛围。同时，推动老年教育机构与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共建共享，补齐社区老年人活动场所有短板，丰富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还要加强孤寡老年人探访关爱服务，加强宣传引导，营造良好敬老孝老氛围，进一步弘扬孝老敬老的社会风尚。

中华传统美德是中华文化的精髓，也是新时代道德建设的不竭源泉。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构建中华传统美德传承体系”的重要任务，对新时代传承和弘扬中华传统美德提出了新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文化建设来说，守正才能不迷失自我、不迷失方向，创新才能把握时代、引领时代。”构建中华传统美德传承体系必须坚持守正创新。“守正”主要体现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指导思想、遵循道德建设的基本规律；“创新”主要体现在传承思路、传承话语、传承机制和传承形式等方面。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马克思主义认为，文化作为上层建筑由经济基础决定，同时又具有相对独立性。中华传统美德作为文化传统，需要在历史发展进程中重新定位；既要承认其形成于封建生产关系的历史局限性，也要善于提炼其中超越时代的伦理价值，避免陷入历史虚无主义或复古主义的极端。例如，传统孝道中的一些理念规范，需结合现代社会发展进行转化，保留敬老尊亲的核心价值，剔除束缚个人发展的封建礼教成分。这种辩证分析为传统美德的现代转化提供了方法论指导。构建中华传统美德传承体系的过程，就是立足当代中国实际，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推动传统美德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过程。

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和中华文化的主体性。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的内在要求。构建中华传统美德传承体系，必须不断巩固和加强党对文化事业的全面领导，促进全体人民在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上紧紧团结在党中央周围。文化主体性指某一文化群体如民族、国家、社群等，在文化实践和认同中表现出的自主性、能动性 and 独特性，强调一种文化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自我意识、价值观念 and 实践能力，使其能够主动塑造自身文化身份。构建中华传统美德传承体系，就要坚守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夯实基础。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物质贫困不是社会主义，精神贫乏也不是社会主义。两个文明都搞好，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加强公民道德建设、提高全社会道德水平，是适应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迫切需要。为此，应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努力形成具有中国特色、时代特征的中华传统美德传承体系，进而推动形成适应新时代要求的思想观念、精神面貌、文明风尚、行为规范，不断丰富人民精神世界、推动人的全面发展。

遵循道德建设基本规律

道德建设既传承历史文化，又依赖个体自觉，还受到社会制度约束，是一项遵循社会发展规律与历史发展规律的复杂系统工程。与之相适应，构建中华传统美德传承体系，应遵循道德建设基本规律，唯此才能确保这一体系既科学有效，又深入人心。

激发个体道德自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加强全社会的思想道德建设，激发人们形成善良的道德意愿、道德情感，培育正确的道德判断和道德责任，提高道德实践能力尤其是自觉践行能力，引导人们向往和追求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构建中华传统美德传承体系，应注重激发中华儿女的道德主体意识和道德传承意识，实现道德认知、情感与行为的有机统一。

推动个体道德修养与社会教化机制的双向互动。个体道德修养与社会教化机制，共同构成中华文明传承千年的伦理密码，也为传统美德的现代转化提供了宝贵历史经验。这种互动机制，在个体精神世界的塑造与社会价值体系的建构之间形成了持续的能量交换。在文明对话日益频繁的时代背景下，构建中华传统美德传承体系，既是文化自信的体现，也是文明创新的契机。应持续深化个体道德修养与社会教化创新双向互动机制，为推动中华文明伦理智慧的现代诠释，教育引导全社会自觉遵守法律、遵循公序良俗注入强大动力。

将传承中华传统美德贯穿公民道德建设全过程。中华传统美德的当代传承，需要突破单向度的道德说教与碎片化的文化符号传播，构建起覆盖道德主体全生活场景、全生命周期的立体化培育体系。全方位美德培育体系的构建，本质上是传统美德基因重新编码到现代社会的操作系统之中。当美德传承从文化自觉升华为制度创新，从个体修养扩展为文明生态，中华伦理智慧就能在当代社会实现创造性转化。这种转化不是简单的文化复刻，而是在守护精神本源的同时，构建起具有时代生命力的道德观念与文明形态。

创新传承话语、机制和形式

随着社会形态、技术手段和传播方式的变革，传统美德传承需要在保持其核心理念的同时，通过多元化的创新形式实现有效传播。

中华传统美德传承要适应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需求。中华传统美德的现代化转型，既是“两个结合”的生动实践，也是破解社会转型中“伦理失序”“道德滑坡”等现象的文化方案。例如，儒家义利观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结合，形成“以义制利、义利共生”的商业伦理，既抵制资本无序扩张，又能激发创新活力。实践中，通过挖掘仁爱、民本、诚信、正义、和合、大同等价值理念，传统美德不仅为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文化根基，更在数字文明时代构建了“情感共鸣—价值认同—行为自觉”的完整链条。

实现话语的转化和融通。推动中华传统美德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本质，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实现传统伦理基因的现代表达，即通过概念转译、价值重构、实践嵌入、文明互鉴等，使中华传统美德既保持文化主体性，又获得现代适应性，最终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道德话语体系。以“诚信”为例，通过“传统文化+现代征信+数字治理”的三重转化，发展成涵盖个人信用、企业 ESG 评价、国家国际信誉的系统工程，彰显出传统伦理的现代生命力。

健全多层次的传承机制。构建中华传统美德传承体系，应形成由党委领导、党政群联合推动、各相关部门分工合作、全社会广泛参与的综合工作机制。各级党委和政府切实履行主体责任，文化、教育、民政、宣传等部门之间加强沟通协调和资源共享，打造多元共治格局、形成传承发展合力。以专项资金支持与传统美德相关的教育、研究、传播项目；以政策引导、物质激励等形式，鼓励个人、家庭、社区、企业等多元主体参与传统美德的传承与弘扬。打造以学校教育为主阵地、家庭教育为基础、社会教育为补充的教育传播机制，通过政府引导、社会参与、全民行动，建立起全员传播机制，使中华传统美德在新时代焕发新的活力。

开创多元化的传承形式。构建中华传统美德传承体系，需突破单一维度的线性传播模式，通过制度、技术、社群、空间的复合维度构建协同共生的传承生态。制度保障层面，以法治化与政策引导的双轨驱动，将法律规范的刚性支撑和政策设计的柔性引导相结合；教育渗透层面，将学前的情感启蒙、学校教育的内容优化和社会教育的创新载体相结合，构建全生命周期培育体系；技术赋能层面，将数字生态的沉浸式传播、算法推荐的精准触达、区块链技术的信用固化和元宇宙空间的场景再造相结合，实现数字生态的沉浸式传播；社群实践层面，通过家庭—社区联动机制、职业伦理重塑工程和青年社群文化创新等方式，实现生活化场景的具身培育；国际传播层面，通过全球治理的话语转化、文化符号的现代诠释和产业输出的伦理嵌入，实现文明对话的价值互鉴。这种立体化传承机制，有助于通过制度保障确立价值坐标、教育渗透培育认知基础、技术赋能扩大传播效能、社群实践促成行为养成、国际传播增强文化自信，能为数字时代的价值传承提供有效支撑。

在守正创新中构建中华传统美德传承体系

唐慧玲

理论视界